

刘 锡 诚

小说创作漫评

刘 锡 诚

小说创作漫评

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长沙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评论当代小说创作的重要文集。作者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编辑工作，对全国小说创作的情况相当熟悉。为了浇灌香花，剪除杂草，作者写了大量的评论。这些文章不仅概述了在全会精神指引下，小说创作的前进轨迹，而且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对创作中的成败得失，作了具体的有说服力的评价与分析。这对当前创作的健康发展，对初学写作者和文学爱好者的成长与提高，都是很有助益的。

小说创作漫评

刘 锡 诚

责任编辑：张永如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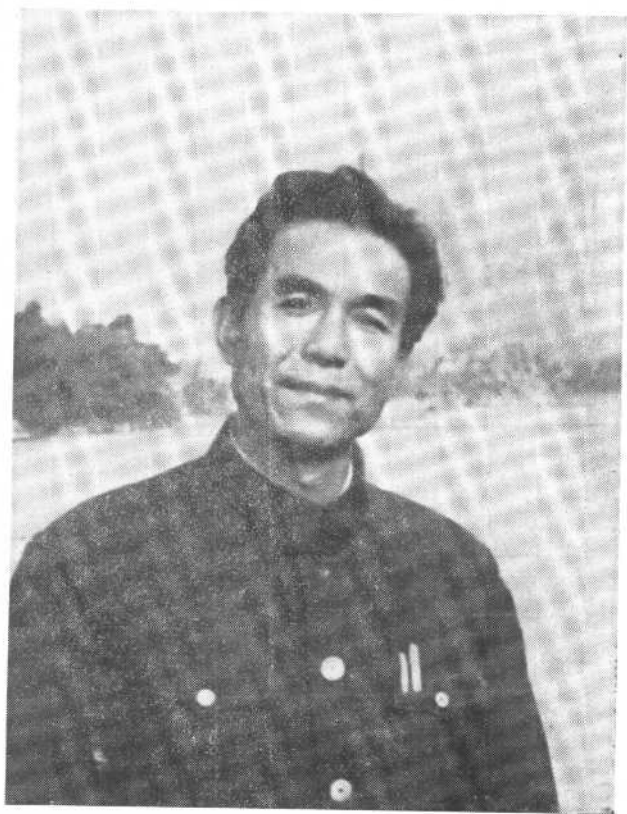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99,000 印张：8.625 印数：1—12,600

统一书号：10109·1429 定价：0.79元



作者近影

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

~~兼谈其创作问题~~

刘锡成

中篇小说的振兴，据说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我们新时期的文坛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越来越多的作家（包括诗人）转向了小说，越来越多的小说家转向了中篇。这是一个谁也不能抹煞的现实，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趋向。

是什么因素促使文学出现了这种转变？也许人们可以列举出许许多多的原因，但我只相信一点，即生活在向中篇招手和呼唤。比起建国初期的十七年来，当今社会生活是更为复杂了。特别是在全民族经历了一场巨大的、不亚于火山爆发那样的浩劫之后，人们的思想变得异常复杂了。这样复杂的社会生活自然要求一定的文学形式去适应它。在这种情况下，中篇小说在短篇小说获得一定的发展之后振兴并繁荣起来，是不难理解的，也是合乎实际的。因为就对生活概括的深度、广度、容量而言，

作者手迹

目 次

谈谈当前短篇小说的创作	1
惟其真实，才有生命力	9
——一九七九年中短篇小说创作随想之一	
悲剧，激发人们前进的力量	20
——一九七九年中短篇小说创作随想之二	
流连忘返	31
——一九七九年《北京文艺》短篇小说印象	
走革命现实主义之路	42
从思想到艺术的突破	54
——谈一九八〇年的短篇小说	
一九八〇年全国得奖短篇小说漫评	66
对新人物的探索	80
——读几篇反映工业战线的短篇小说	
乔光朴是一个典型	96
向生活的深处开掘	106
——读若干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中的农村现实	116
关于文学反映农村生活问题	125
中篇小说杂谈	130
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	137
读谌容的两部中篇小说	152
美的发现	163
——《天云山传奇》人物谈	
并非童话	171
——评《一个冬天的童话》	

深沉·浑厚	176
——评何士光的小说	
在生活的激流中	183
——评徐慎近年来的短篇小说	
评陈国凯的小说	192
耕耘者的足印	210
——评谢璞的小说近作	
找到了自己	217
——评叶蔚林的小说	
希望在人间	235
——谈祝兴义的《杨花似雪》	
小说创作中的反封建意识	240
在新的课题面前	251
——从反官僚主义的小说谈起	
新形势向“山药蛋派”提出了新问题	263
文字要紧凑 思想要开阔	269
——学习高尔基论短篇小说札记	
后 记	273

谈谈当前短篇小说的创作

在粉碎“四人帮”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以来的两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大批为群众所喜爱的短篇小说。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出版的《短篇小说选（1977—1978·9）》一书里选辑了一九七八年前九个月里发表的十九篇作品；上海文艺出版社编选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神圣的使命》中选辑了二十篇，《爱情的位置》中选辑了十二篇。这三个集子合在一起，去掉重复者外，总共选了四十一篇短篇作品。在这些选本定稿付型之后，各地报刊上又发表了好几篇相当有特色的小说，其中象肖平的《墓场与鲜花》（《上海文艺》十一月号）、王蒙的《光明》（《上海文艺》十二月号）、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人民文学》第十二期）、林雨的《家庭悲剧》（《十月》丛刊第二辑）、孔捷生的《锁王传略》（《作品》十月号）、马烽的《李德顺和他的女儿》（《汾水》十二月号）、齐平的《看守日记》（《解放军文艺》十二月号）、顾工的《翻案》（《解放军报》十一月二十七日）等等。在这次《人民文学》杂志社举办的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中，由群众推荐参加评选的就有一千多篇。这次得奖的二十五篇优秀短篇小说就是从中评选出来的。这些短篇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有新的突破，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提出了并回答了广大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发挥了短篇小说侦察兵的战斗作用。

短篇小说的初步繁荣，向文艺评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例如：短篇小说要不要揭露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要不要表现时代精神？怎样处理好歌颂与暴露的关系？如何克服当前出现的抢题材、新公式化和模仿的不良倾向？等等。如果在理论上认真研究和阐明这些问题，会有助于短篇小说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近两年来的短篇小说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是在恢复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许多优秀作品所以受到读者的欢迎，除了它们在艺术上达到的成就之外，主要是因为它们在思想内容上触及并揭露了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表现了时代的精神，反映出社会现实的某些本质方面。

一篇小说，不管它的艺术形式多么优美，假若它没有反映出时代精神，或者反映得很不好，那它就不会引起读者的共鸣，因而也就不会赢得社会舆论的注意。我们常常听到有些作者埋怨他的作品问世之后，舆论界无声无息，颇有不平之色。殊不知，其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作品本身没有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真实矛盾，因而也就没有表现出时代精神，或者表现得不好。短篇小说《班主任》在艺术上并不是一篇白璧无瑕、无懈可击的作品，但它一出世就赢得了万千读者的赞赏，撼动了人们的心灵。原因很简单，就是它体现着强烈的时代精神。粉碎“四人帮”之后，千百万人民都在思考着林彪、“四人帮”给我们的党、国家、社会、家庭，特别是青少年一代造成的外伤、内伤怎样医治、怎样康复这样重大而严峻的社会问题时，刘心武的这篇作品适时地作了初步的回答，说出了郁积在人们心里想说但由于还未

找到恰当的表现形式而没有说出来的话。宋宝琦和谢惠敏这两类表面看来水火不相容的孩子，却都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恶劣政治环境中的畸形儿。这就是别的作者还没有发现、而由刘心武首先向文学领域提供的新东西。卢新华的《伤痕》读来不免感到有它幼稚的、某些细节描写方面缺乏生活真实的弱点，但读过它的读者大都被感动得潸然泪下，不能自己。作者从生活中大量常见的普通现象中发掘并提炼出“伤痕”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主题思想。他大胆地用悲剧的形式向广大读者宣告：是林彪、“四人帮”给整个社会、许多家庭、干部甚至青年一代的精神留下了难于平复的“伤痕”。这“伤痕”甚至比饱经沧桑的妈妈身上的鞭痕还要深得多。小说里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移、坚贞不屈的妈妈身上所体现的那种精神，不正是我们社会的精神吗！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和王蒙的《光明》打破了长时期以来文学作品对我国法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冤狱、冤案堆积如山这一问题的缄默，大胆而锋利地提出了维护法制、保障人民民主是人们的神圣使命这一深刻思想，一下子唤起了广大读者的同情。林雨的《家庭悲剧》里韩主任与谢兰的悲欢离合并不是作者任意杜撰的离奇故事，它揭示了产生这类悲剧的深刻社会背景：主人公内心的美与家庭生活的和谐被破坏，是只有林彪、“四人帮”当权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的。这篇作品能使类似遭遇的人产生感情上的强烈共振。

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短篇小说都能表现强烈的时代精神，那样的要求是过分的苛求。因为一个短篇小说毕竟不是奇伟壮观的艺术大厦，而不过是“一雕栏一画础”^①而已。但是，不可否认，

① 鲁迅：《三闲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小引〉》。

短篇小说应当面对现实，有责任提出和回答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应当深刻地揭露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真实矛盾；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起到它的作用，才能推动社会的前进。

文学历来就是以正视现实、“干预”生活而对人类社会发生着有益作用的。如果作家不正视现实，他的作品何来的时代精神？如果作品没有时代精神，又何以能“干预”现实生活？吴敬梓是正视现实的，所以他的《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具体地、生动地揭示了封建八股取士制度的反动与腐朽，从而使作品具有进步的政治倾向和人民性。鲁迅不是对生活袖手旁观的，他的《阿Q正传》问世之后，有些人惴惴不安，认为鲁迅是讽刺了他。阿Q的形象和阿Q的精神胜利法至今还常常用于政治生活中，起着它应有的“干预”生活的作用。英国作家狄更斯曾以小说促成了英国各类学校机构的改革，这是人所共知的，在他之前学校里对孩子们是实行残酷的鞭笞和野蛮的虐待的。在社会主义时代，难道就应当取消文学的“干预”现实生活的职能吗？那些曾经把“干预”现实当作异端邪说而加以挞伐的人，不应当从三十年来文艺创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从这两年以来的短篇小说的巨大社会作用中，得出正确的结论来吗？

二

勿庸讳言，近两年来的短篇小说，除了有一部分反映农业战线战天斗地的生活画面和新的人物风貌之外，大部分作品，特别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优秀作品，是反映人民群众同“四人帮”的斗争以及在他们统治下人们的生活情况和精神状态的作品。由于这些作品揭露了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以及他们在干部群众身上造成的内伤和外伤，因而被某些人指责为“暴露文学”。还有的

人认为这些作品是“重蹈”了一九五七年“揭露阴暗面”文学的“覆辙”。在这些同志看来，社会主义文艺的任务就是歌颂，即歌颂光明，塑造可资效法的英雄人物形象，歌颂新人新事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应当有暴露。诚然，说社会主义文艺的任务就是暴露，那自然是荒谬的，片面的；但说社会主义文艺的任务就是歌颂，难道不是同样荒谬吗？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文艺的使命仅仅在于运用形象思维，塑造艺术典型，历史地、真实地反映不断发展着的社会现实。只要作家真正是忠实于革命现实主义原则，那他必然会对光明势力热烈歌颂，对黑暗势力进行暴露。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所造成的历史的大倒退和政治的黑暗，难道社会主义的文艺不应当去加以暴露吗？历史学家只能按历史科学的要求记载下这次历史大倒退的事件，总结其规律，但他们却不能如画地把当时的生活画面描绘给后人看，使后人得到直观的形象的感受。而这个光荣任务就落到了作家的肩上。现在，我们的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不过是开始反映了一点点这方面的内容，对这个曾经篡夺了一部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阴谋集团及其影响的揭露还非常不够。其所以不够，这是因为：第一，从一个侧面深刻反映这个集团怎样欺世盗名、篡党窃国而又塑造出具有典型意义的形象的作品至今还没有产生，而人民群众是期待着这种作品出世的；其次，当前出现的短篇小说比较偏重于描写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家庭悲剧和个人不幸（冲破了文艺不能写家庭、不能写人情、不能写知识分子的禁区，是应予肯定的），而对工厂、农村以及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工人、农民在这十年的际遇特别是他们的悲剧与不幸，则写得还不多，更谈不到深刻。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文艺不能按某些人脑子里想象出来的条条和比例去反映生活现实，而必须历史地、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的本质

面貌和实际发展，一切脱离开现实生活的实际面貌而空谈歌颂的理论，是注定要遭到人民群众的唾弃的。社会主义文艺对林彪、“四人帮”的“全面专政”的“社会主义”的暴露愈深刻、愈典型，就愈能显示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和生命力，就愈能刻画出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熏陶和教育几十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远大理想和革命情操。这种文学本身既恢复了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又充满着鼓舞人们前进的理想。它暴露和批判了黑暗，但并不是恢复到批判现实主义去。

不错，当前出现的一批短篇小说，也揭示了人民群众身上的一些缺点、伤痕，暴露了社会主义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例如法制的健全，民主生活的缺乏，不正之风的泛滥，“左”比右好的思想，官僚主义、家长作风、思想僵化，瞎指挥，家庭悲剧、爱情悲剧，青年中的看破红尘思想，政治生活中落井下石的品质，工作中的推诿塞责，等等。这类的缺点、缺陷能不能表现和批判呢？如果我们承认社会主义文学的反映现实和“干预生活”的职能和特点，那么我们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指出人民身上的某些缺点和伤痕，目的在于引起社会的重视和疗救，而不是为了嘲笑和愚弄他们。反映社会主义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目的在于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从而消除几千年来封建主义思想对国家和人民的影响与束缚，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文学应当有大量优秀的作品歌颂具有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人。我们期待着小说作家们塑造出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人物形象来，鼓舞人民前进。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小说创作自然而然地要用更多的精力和笔墨去表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斗争的英雄们的风采。这是我们应当大力提倡的。但文学毕竟有自己的规律，不大

可能象报纸的报道那样迅速、全面地“转移”过来，因为作家们对新的现实生活、对新的人物还要有一个认识和熟悉的过程。我们希望这个过程尽量地缩短，步伐尽可能地加快。这并不是说揭批“四人帮”的作品不需要再写了。我们提倡的是用文学的形式表现新的人物，而不能规定作家去写某些题材，阻止作家去写另一些题材。对林彪、“四人帮”的揭露不仅与表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矛盾，甚至仍然是非常需要的。

三

短篇小说创作已经冲破了一些过去不敢接触的禁区，如写悲剧，写爱情生活，写人的感情，写人民的缺点，作品中可以没有正面主人公，英雄人物可以有缺点……初步打破了题材狭窄的僵死局面，使它再度变成人民群众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但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刚刚挣脱了公式化、模式化、概念化的镣铐之后，就有一些短篇小说在艺术构思、情节结构、人物描写等方面，重新陷入了公式化、模式化、概念化的窠臼。事情往往是这样的：出现了一篇写家庭悲剧的好小说，过不多久就会有好多篇故事情节大同小异的小说纷至沓来；发表了一篇描写爱情纠葛的优秀篇章，过不多久又会有一连串似曾相识的作品接踵而至。即使在某些读者认为比较成功的作品中，也还存在着“图解政策”、“从概念出发”的倾向，大量的令人乏味的政治说教代替了艺术描写。作品的题材也还不够多样，不够广阔，而抢某种时髦的题材的怪现象，似又有所抬头。读者对某些短篇小说创作中出现的题材雷同、人物大同小异、情节发展单调的倾向，已经开始有所不满了。

这种弊端的出现说明了什么呢？是现实生活本身不够丰富多采？是革命斗争不够威武雄壮？我想都不是。出现上述现象，归

根结蒂是因为有些作者不愿意在研究生活、思考现实以及艺术概括与提炼上下苦功夫，不愿意在艺术表现手段上作艰苦的劳动和创新的探索。文学艺术是从属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但它并不从属于某些具体的政策；如果把艺术创作变成某些具体政策的注脚，就等于取消了艺术创作本身。同样，艺术创作不应当成为某些哲学理念或政治概念的图解，否则，艺术创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公式化、模式化、概念化的出现，归根结底是违反了创作必须从生活出发这一基本原则，而同“从路线出发”、“从理念出发”、“主题先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俄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精辟地指出的：“艺术可以是某种思想和倾向的传播者，但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一篇短篇小说尽管它写的是社会生活的一鳞一爪，但如果不是作家对生活确有所感，对生活加以集中概括，如果其中没有来自生活的形象和人物，没有任何典型的东西，而只是哲学理念、政治概念的敷衍，那这肯定不是一篇出色的作品。

同样，模仿也不是艺术，艺术作品贵在独创。这种独创是从观察、研究生活开始的。一个作家要善于从生活中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典型的东西，然后通过艺术形象把它巧妙地体现和揭示出来。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所以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就是因为作者在生活中发现了爱情物质化这种庸俗的典型的现象，然后又较早地用艺术形象体现和揭示出来。而一些模仿性的作品由于作者没有从生活中发现独到的东西，没有把握住生活的本质真实，因而也就没有通过成功的艺术形象把生活的本质真实转变为艺术的真实。

一九七九年二月

惟其真实，才有生命力

——一九七九年中短篇小说创作随想之一

一

如果要认真地探求去年以来中短篇小说创作有什么值得重视的特点，我以为最显著的特点是基本上扫除了林彪、“四人帮”长期兜售的虚伪的、瞒和骗的反现实主义文艺的余毒，正视现实，恢复并坚持了文艺的真实性原则，使革命的现实主义得到了深化。

一年多来，许多作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解放思想，以思想家的冷静和艺术家的激情，去描绘刚刚过去的那些动乱年代的生活；正确评价、热情讴歌老一辈革命家和革命战争年代，以及我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反映当前的社会矛盾，探索和发掘生活深处的种种社会问题，写出了许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由于写了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境遇，真实的环境和真实的感情，真实地而不是虚妄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本来面貌，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这种盛况使一九七九年以来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成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真实性虽然不是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全部内容，却是所以成为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条件。只有在真实可信的生活画面上，描绘出活动着的真实人物及其相互关系，才能拨动读者的心弦，

激起读者的强烈感受；只有真实地历史地反映出发展中的社会生活，才能发挥文学“促进人的意识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改善”（普列汉诺夫语）的积极作用。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就根本谈不上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

在文学史上，凡是属于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家，尽管各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和艺术见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主张文学应当真实。也只有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才使各具特色的作家成为现实主义作家。文学作品就是应当按生活所呈现的客观面貌去反映它，即使它与作家的审美评价和政治观点不一致，也不应歪曲生活面貌。现实主义的文学巨匠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果戈里、屠格涅夫都是如此。当今的读者从他们不朽的作品中所看到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真实生活画面，而不是他们的学说。无产阶级作家在主张文学的真实性这一点上，同以往的现实主义作家没有什么不同，也不应当不同。所不同的，是后者没有掌握观察和分析生活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而无产阶级作家则以这样的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观察生活、评价生活的指导。因而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在真实地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的东西上，无产阶级作家应该而且实际上大大超越了以往的现实主义作家。

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认识同十七年间某些流行的理论并不相同。流行的理论否认生活的真实性是一种客观存在，过分强调了或夸大了在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过程中主观的作用，用政治性取代真实性。因而，把大批优秀的或比较优秀的、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生活真实的作品打成了反社会主义的、“歪曲”现实的毒草。从而助长了虚伪杜撰、粉饰和歪曲生活、宣扬无冲突论等唯心主义文风的恣肆泛滥。粉碎“四人帮”之后，文学的真实性问